

敦煌  
写本

# 《大智度论》

研究

刘显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613443

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kyqd1048)

写敦  
本煌

# 《大智度论》研究

■ 刘 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研究/刘显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87 - 3525 - 2

I. ①敦… II. ①刘… III. ①中观派 - 佛经 - 研究 - IV. ①B94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3710 号

---

书 名: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研究

著 者: 刘 显

责任编辑: 向 飞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26806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http://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 / 16

印 张: 13.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凡例

1. 本文所论“敦煌写本《大智度论》”皆出土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凡非敦煌藏经洞出土或不能肯定者，不予收录。非汉文“敦煌写本《大智度论》”亦不在本文收录范围。

2. 文中所引敦煌文献资料，除特别注明外，一般据《敦煌宝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图版。文中“P.”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伯希和编号；“S.”指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斯坦因编号；“Дx”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敦煌编号；“Φ”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弗鲁格编号；“BD”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北敦煌编号；“北”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北编号（附该件千字文编号）；“新”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新编号；“散”指王重民编《敦煌遗书散录》旧编号；“津艺”指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上图”指上海市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浙敦”指《浙藏敦煌文献》编号；“敦研”指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编号；“敦博”指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台中图”指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3. 引用敦煌文献时，全部标明卷号，如 S. 1621 号。若同一写卷抄有不同内容，则在卷后以 A、B、C……标明该文书所在次序，如 S. 4006A 号。若为背面文书，则以卷号加英文字母 V (Verso) 表示。

4. 校录敦煌文献时，缺字用“□”符号表示，缺几字就用几个“□”，

不能确定字数者用“□”表示。缺字据上下文或他本补出时，所补之字以“[ ]”括之。模糊不清，无法辨识者用“☒”表示，有几个就用几个“☒”。原文有错字、借音字时，则在原字后加“（）”号而填入校定之字。如果原文献字行有残缺，用“□”符号表示前端残缺，用“□□”符号表示中间残缺，用“□□□”符号表示后端残缺。用“+”表示残卷之间的缀合。

5. 敦煌写本俗字别体众多，一般径改为通行繁体字。但在必要时酌情保留部分俗字别体。

6. 敦煌写本没有标点符号，为方便阅读，本文在引用敦煌写本原文时皆施以现代通行标点符号。《大正新修大藏经》标点错误百出，向来为人所诟病，引文中一般径行改正，为避文繁，不出校记。

7. 《大智度论》的别名很多，为避免分歧，本文一律统称《大智度论》。写卷若标明卷次的，则沿用；若分卷与《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不同，则在定名后以括号注明“异卷”以示区别；若未标明卷次，则据《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相关卷次定名。至于诸家目录对写卷的定名，若照单全收，将不胜其繁，故叙录只收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和写卷出处图版之定名。

8. 征引文献一般在首次引用时注明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再次引用时则只标注书名和页码。常用征引文献使用简称，本文常用征引文献简称如下：《敦煌宝藏》（简称《宝藏》）、《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简称《法藏》）、《俄藏敦煌文献》（简称《俄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称《国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简称《台中图》）、《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简称《上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简称《津艺》）、《甘肃藏敦煌文献》（简称《甘藏》）、《浙藏敦煌文献》（简称《浙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简称《总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简称《新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简称《孟目》）、《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中华大藏经》（简称《中华藏》）、《汉语大词典》（简称《词典》）。

# 目录

敦煌写本  
《大智度论》  
研究

001 凡例

001 第一章

## 绪论

002 第一节 鸠摩罗什和《大智度论》

006 第二节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研究概述

009 第二章

##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叙录

101 第三章

##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的文本特征

103 第一节 纸张和形制

107 第二节 书写符号

113 第三节 卷品开合

114 第四节 行文

118 第五节 俗字

121  
■ 第四章

■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校勘研究

149  
■ 第五章

■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词语研究与辞书编纂

150  
■ 第一节 增补《汉语大词典》未收的词目

170  
■ 第二节 提前《汉语大词典》书证的时间

185  
■ 第三节 补充《汉语大词典》的书证

194  
■ 第四节 补正《汉语大词典》的释义

■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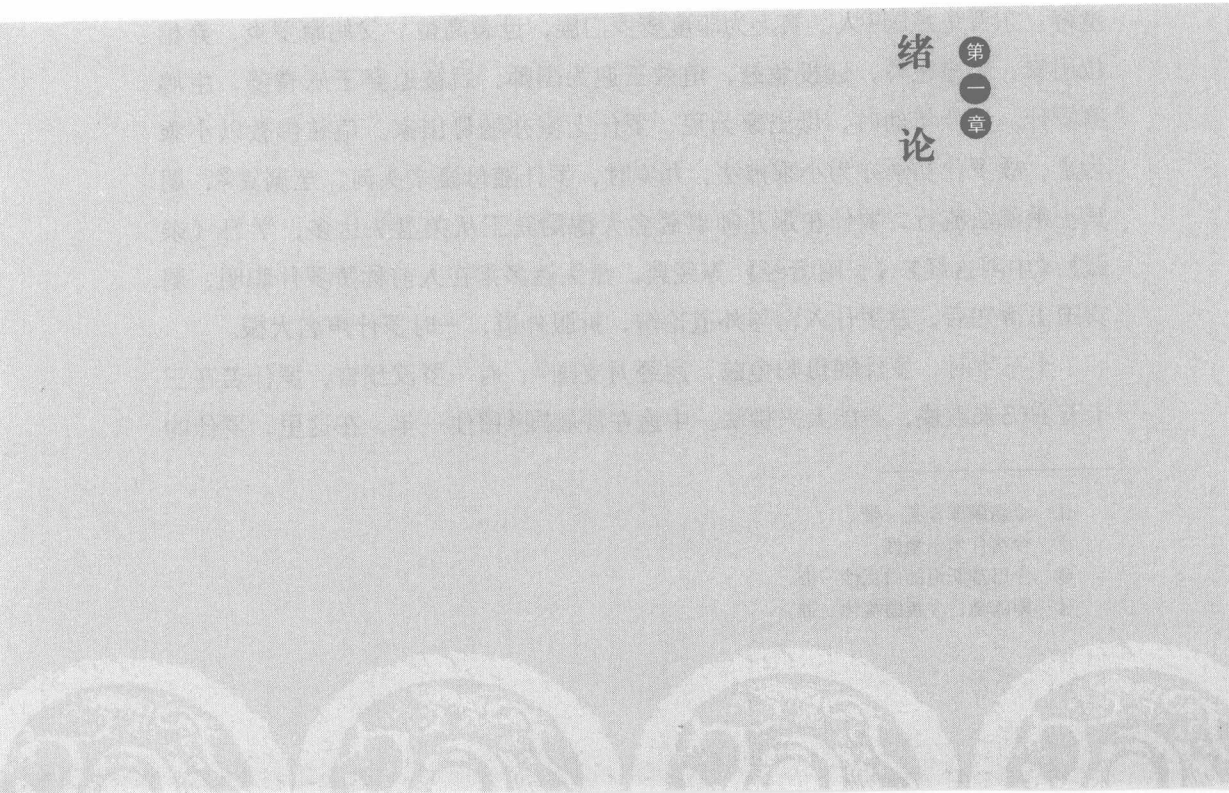
203  
■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收藏情况一览表

208  
■ 参考文献

# 敦煌写本 《大智度论》研究

绪论

第一章





## 第一节 鸠摩罗什和《大智度论》

### 一、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3~413），又作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称罗什，意译童寿。东晋龟兹国<sup>①</sup>人。祖上为印度婆罗门族，世袭高位。父鸠摩罗炎，弃相位出家，东渡葱岭，远投龟兹，龟兹王迎为国师，后被迫娶王妹耆婆，生鸠摩罗什。罗什年幼时，母出家为尼，罗什七岁亦随母出家。龟兹佛教以小乘为主，故罗什初学亦为小乘佛法。九岁时，罗什随母渡辛头河，至罽宾<sup>②</sup>，罽宾小乘佛法流行，罗什在那儿师事著名大德罽宾王从弟盘头达多，学习《杂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等经典。盘头达多常在入前称赞罗什聪明，罽宾国王得知后，邀罗什入宫与外道论辩，折服外道，一时罗什声名大振。

十三岁时，罗什随母归龟兹，途经月支国<sup>③</sup>，有一罗汉预言，罗什若在三十五岁仍未破戒，必能大兴佛法。中途在沙勒国<sup>④</sup>留住一年，在这里，罗什的

---

① 今新疆库车县一带。

② 今喀什米尔地区。

③ 今巴基斯坦的白瓦沙一带。

④ 即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

修学方向发生改变。沙勒国佛教大小乘并行，罗什先学小乘，后受教于在沙勒讲学的莎车<sup>①</sup>大乘名僧须耶利苏摩，须耶利苏摩为罗什讲授大乘经典《阿耨达经》，罗什深有所悟，从此放弃小乘，改宗大乘。

一年后，罗什复随母北行，经龟兹国北邻温宿国<sup>②</sup>时，又以论议挫败当地一著名外道，声誉益著。龟兹王大喜，亲自来温宿国将其母子迎回国内。归龟兹后，罗什继续宣扬大乘佛法。不久，其母往印度，临行勉励罗什到中国弘法，罗什毅然引为己任。母亲走后，罗什一直留住龟兹，长达二十余年。

罗什极高的声誉，使中国北方的统治者十分仰慕。当时高僧道安在长安，致力于译经事业，听说罗什的大名后，“思共讲析，每劝坚取之”<sup>③</sup>。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大将吕光率兵七万西征，出发前苻坚嘱咐吕光：“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sup>④</sup>建元二十年（384），吕光攻克龟兹，但因吕光不信仰佛教，又见罗什年纪尚轻，故生轻视之心，强迫罗什娶龟兹王女为妻以辱之。次年，苻坚被杀，吕光割据凉州，自立为凉王。罗什遂淹留凉州。后秦姚苌继苻坚称帝于长安，慕罗什高名，极力邀请，而吕光父子恐罗什的才能为秦所用，与己不利，故不放其东行。罗什留后凉凡十七载。

姚兴嗣位，于弘始三年（401）出兵攻后凉，凉主吕隆兵败投降，送罗什入长安，时年罗什五十八岁。姚兴崇佛，积极扶持和发展佛教，他视罗什为国师，将罗什请入长安逍遥园。从此罗什在此专事译经，未尝停歇。弘始十五年（413），罗什因疾，卒于长安，时年七十。罗什临终遗言：“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sup>⑤</sup>后于逍遥园以火焚尸，果如其言，形骸俱化，唯舌不坏。

罗什译籍数量较多，历代经录说法不一。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记为三

① 今新疆沙车县。

② 今新疆温宿县。

③ 《梁高僧传·道安传》，见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96，50册页354。

④ 《梁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大正藏》50册页331。

⑤ 《梁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大正藏》50册页332。

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为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列为七十四部，二百八十四卷。实际现存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三卷。罗什来华后专力翻译，著作不多。据《梁高僧传》记载，罗什曾作《实相论》《注维摩经》等，均佚。现存有后人所集为答慧远十八问而作的《鸠摩罗什法师大义》三卷。此外，《广弘明集》收载与姚兴书信两封。

作为中国四大译经家<sup>①</sup>中最早的一位，罗什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他的译经对“空观”作了全面而又准确的阐述，从而为解决长期以来般若学的纷争创造了条件。他翻译的《法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成实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后代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成实宗、三论宗等佛教宗派依据的主要经典，《十诵律》《比丘戒本》和《梵网经》进一步完备了汉地的佛教戒律。

在语言和文风上，罗什的译经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不仅充分地传达了原典的旨意，而且行文优美，流畅洗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因而深受信众的喜爱，流传甚广。如影响中国文化很大的《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阿弥陀经》等虽有其他译本，但直到今天流传盛行的还是罗什的译本。

罗什门人甚多，号称三千，其中最著名的是僧肇、僧睿、道融、昙影四人。后世有所谓“四圣”<sup>②</sup>、“八俊”<sup>③</sup>和“十哲”<sup>④</sup>之称。

## 二、《大智度论》

《大智度论》，凡一百卷，印度龙树著，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

① 指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影响最大的四位译经家。有二说：（1）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2）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

② 即道生、僧肇、道融和僧睿。

③ 即“四圣”外加道恒、昙影、慧观、慧严四人。

④ 即“八俊”之外再加僧契和道标。

至弘始七年(405)在长安逍遥园西明阁译出<sup>①</sup>。《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sup>②</sup>的论著,又名《大智度经论》、《摩诃般若释论》《大智释论》《释论》《智度论》《智论》《大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论》等。《大智度论》的译本一百卷尚非全译,僧叡在《大智释论序》中说:“经本既定,乃出此释论,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楚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sup>③</sup>卷末的附记亦云:“论初三十四卷,解释一品,是全论具本。二品以下法师略之,取其要足以开释文意而已,不复备其广释,得此百卷,若尽出之,将十倍于此。”<sup>④</sup>即谓《大智度论》的梵本有十万偈,如果全部译出,将有一千多卷,鸠摩罗什认为华夏之士喜欢简洁,不习惯冗长烦琐的议论,因而只是将解释名相事数的《序品》依照梵本,全部译出,成三十四卷。自第二品《奉钵品》以下至第九十品《嘱累品》择要节译,成六十六卷,共一百卷<sup>⑤</sup>。

《大智度论》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叙及的历史、地理、譬喻、教理、修持、人物、部派、经典以及其他概念术语作了详尽的解释,突出论述了以“六波罗蜜”<sup>⑥</sup>为纲领的大乘佛法,它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依用援引

① 关于《大智度论》的作者,近代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代表人物如比利时的拉蒙特,日本的干潟龙祥、平川彰和加藤纯章。拉蒙特认为《大智度论》并非龙树所作,而是西北印度某一说一切有部而转学大乘的学者所造,参拉蒙特著,郭忠生译《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谛观》第62期,1990年7月,页97~179。干潟龙祥虽仍肯定《大智度论》为龙树所作,但是认为鸠摩罗什在汉译过程中对其内容已有所增修,参干潟龙祥著《大智度论の作者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7卷第1号,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页1~12。加藤纯章认为《大智度论》的作者不是龙树,此人很可能来过西域,并和罗什一起完成了《大智度论》的写作,参加藤纯章著,宏音译《大智度论的世界》,《谛观》第52期,1988年1月,页1~47。

② 亦称《小品般若》,即历史上曾多次翻译过的《放光般若》《光赞般若》和唐代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的第二分。

③ 《大正藏》,25册页57。

④ 《大正藏》,25册页756。

⑤ 一些学者对是否存在这样十万偈的梵本提出了质疑,如印顺法师认为没有所谓“千有餘卷”的广本,因为僧叡自己疏忽了经论合编一事,误将一百卷当作是《大智度论》的论文一百卷,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参印顺述,昭慧记《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一文,《东方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页9~70。

⑥ 即檀波罗蜜(布施)、尸罗波罗蜜(戒律)、羼提波罗蜜(忍辱)、毗梨耶波罗蜜(精进)、禅波罗蜜(禅定)、般若波罗蜜(智慧)。

的重要论典，有“论中之王”之称，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论中所引经籍甚多，许多经籍今已亡佚，幸赖该论而得窥其一斑，同时论中还保存了大量当时流传于北印度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因此《大智度论》是今天研究大乘佛教和古印度文化的重要资料。

翻译《大智度论》之际，中国佛教界正盛行般若经的研究，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待《大智度论》一出，诸说顿息。自南北朝至隋、初唐，华北地区特别盛行《大智度论》的研究，历史上注疏甚多，然绝大多数已亡佚，今仅存慧影《大智度论疏》一种，且多残缺<sup>①</sup>。

目前《大智度论》的梵文本尚未发现，但欧美、印度的学术界已陆续有人将汉译本的部分内容译成法文、英文与德文。其中，比利时学者拉蒙特穷其一生之精力，把此书的前三十四卷译成法文，并对其详加注释。拉蒙特的翻译是今天《大智度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 第二节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研究概述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藏经洞中出土了多达五万余卷公元5~11世纪的手写本和木刻本文献，这些出土文献和殷墟甲骨文、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朝气蓬勃的国际显学——敦煌学。

然而毋庸讳言，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敦煌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众所周知，敦煌文献90%以上是佛教文献，可与之不相协调的是，长

<sup>①</sup> 《大智度论疏》原为二十四卷，今仅存七卷。北周僧慧影撰。本书卷十四、卷二十一，收于《卍续藏》第七十四册；卷一、卷六、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四，收于《卍续藏》第八十七册。系仅存之《大智度论》注释书。慧影为智度论师道安之弟子，因辑录道安有关《大智度论》之讲述而作此注释书。内容亦融和道凭之五时教判、道场法师之事迹、北地研读智度论之盛况等。参慈怡《佛光大辞典》，台湾佛光山出版社，1989，页864。

期以来学界对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对已入藏佛教文献<sup>①</sup>的研究更是如此。据方广锬先生初步统计，敦煌遗书中约有 60% 抄写的为已经入藏的佛教文献，共有 394 种，占《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应收 1076 种典籍的 36.6%<sup>②</sup>。这些佛教文献虽然已被传统《大藏经》所收，但依然具有较大的校勘与研究价值，可是至今仍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敦煌写本《大智度论》的研究现状亦是如此，国内对其关注较多的是方广锬先生，他在《敦煌学大辞典》中立“大智度论”条目，对《大智度论》写卷的收藏、内容等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指出了敦煌本的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等目录和图版也对涉及的《大智度论》写卷作了著录和解题。

笔者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一直着手对敦煌写本《大智度论》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且有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大藏经〉的校勘不应忽略敦煌写本——以〈大智度论〉为例》<sup>③</sup>一文以敦煌写本《大智度论》与《大正藏》本对校为例，凸显敦煌写本的巨大校勘价值，指出了《大藏经》的校勘中使用敦煌写本的必要性。《敦煌本〈大智度论〉学术价值初探》<sup>④</sup>对《大智度论》写卷在世界各国的收藏情况作了详尽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指出了其在校勘、版本、史料、文字、书法方面的研究价值。《〈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札记》<sup>⑤</sup>《〈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sup>⑥</sup>两篇论文对《大正藏》本《大智度论》的部分章节作了校勘工作。《敦煌写本〈大智度论〉残卷缀合四则》<sup>⑦</sup>对敦煌《大智度论》写卷中的十四个残卷进行了缀合，并对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国外学者中，日本学者对敦煌写本《大智度论》有较多关注，相关研究

① 这里的“已入藏佛教文献”是指已经为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著录的佛教文献。

② 见《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2006年第6期，页139~145。

③ 见《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页180~183。

④ 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3期，页56~58。

⑤ 见《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页19~22。

⑥ 见《辽东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页105~107。

⑦ 见《敦煌学研究》，2008年第1期，页170~195。

成果如小川隆的《敦煌本〈大智度论〉の惠能传に関する一試论》<sup>①</sup>、白田淳三的《敦煌出土〈大智度论〉の诸相（上）》<sup>②</sup>《敦煌出土〈大智度论〉の诸相（下）》<sup>③</sup>、佐藤心岳的《中国における〈大智度论〉の研究讲说——とくに隋时代中心として》<sup>④</sup>、本田义英的《敦煌本〈智度论〉と现行藏经本その本文异同对校》<sup>⑤</sup>《再び敦煌出土〈智度论〉に就て》<sup>⑥</sup>《敦煌出土〈智度论〉に就て》<sup>⑦</sup>、气贺泽保规编《中国佛教石经の研究》<sup>⑧</sup>。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写本《大智度论》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其中，气贺泽保规编《中国佛教石经の研究》一书较为晚出，该书第八章对《大智度论》写卷在各地的收藏情况作了初步调查，并尝试对写卷进行了分类整理，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因文章写于十几年前，当时不少藏品尚未对外公布，所以在资料的收集上欠全面。同时由于过于信赖目录，未亲自复核原卷，文中有一些疏误之处，如北 7303 号（昆 095）所抄实为《阿毗昙毗婆沙论》卷第十四，但作者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宝藏》之误，将其误作《大智度论》写卷著录。又俄 Дх273 号、俄 Дх865 号所抄亦非《大智度论》，然作者沿《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之误，误将其著录作《大智度论》写卷。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敦煌写本《大智度论》研究还很不够，在深度和广度有很大的开掘空间。鉴于此，作为此毕业论文的姊妹篇，笔者将力争在相关写卷资料一网打尽的基础上，整理出版《敦煌写本〈大智度论〉校注》一书，以期为《大智度论》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版本，同时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其他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整理研究的高度重视。

① 见《驹泽大学大学院佛教学研究会年报》，1985。

② 见《佛教学研究》，1981年3月。

③ 见《佛教学研究》，1979年1月。

④ 见《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1972年10月。

⑤ 见《佛典内相外相》，1934年9月。

⑥ 见《佛典内相外相》，1934年9月。

⑦ 见《宗教研究》，1929年3月。

⑧ 气贺泽保规编，《中国佛教石经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页340-409。

敦煌写本

《大智度论》研究

第二章

敦煌写本《大智度论》叙录



敦煌藏经洞出土《大智度论》写卷为数甚多，经过调查各种目录、图版和研究著作，共发现《大智度论》写卷凡 279 件，现收藏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丹麦、中国内地、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具体收藏情况是：英国图书馆藏 76 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21 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 23 件，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4 件，日本京都博物馆藏（守屋孝藏旧藏）4 件，日本大谷大学藏 2 件，日本龙谷大学藏 1 件，日本天理图书馆藏 2 件，日本三井文库藏 1 件，日人羽溪了谛藏 1 件，日人内藤尧宝藏 1 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 1 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92 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2 件，故宫博物院藏 4 件，敦煌研究院藏 13 件，敦煌市博物馆藏 1 件，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8 件，天津市文物公司藏 2 件，天津图书馆藏 1 件，上海图书馆藏 3 件，浙江省博物馆藏 5 件，浙江图书馆藏 1 件，湖北省博物馆藏 3 件，重庆市博物馆藏 1 件，南京艺兰斋美术馆藏 1 件，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3 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藏 2 件<sup>①</sup>。全部写卷所存内容约占全论三分之二以上，抄写时间跨度从东晋<sup>②</sup>至晚唐<sup>③</sup>，其中以南北朝时期写本居多，有些写卷距离《大智度论》翻译时间不过百年，很接近《大智

① 具体收藏情况详见文末所附“敦煌写本《大智度论》收藏情况一览表”。

② 据《国图》、《浙藏》叙录介绍，BD01364 号、BD03741 号、BD05776 号、浙敦 028 号（浙博 003）等皆抄写于东晋时期。

③ 如 P. 2427 号、P. 2913 号、BD06869 号、津艺 241 号、上图 042 号等皆为晚唐写本。